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赵 丽

孩子被人抢了!
6月1日,朵朵一大早就换上演出服装,拉着妈妈的手一蹦一跳地走向幼儿园。突然,一群人冲出来,将朵朵抢走了。抢孩子的不是别人,正是朵朵的亲生父亲。

朵朵妈妈潘妍敏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她和丈夫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曾起诉离婚未果,自己带着孩子住在外边,万万没想到丈夫会抢走孩子。前段时间,身心俱疲的潘妍敏同意法院调解离婚,朵朵的抚养权归男方。

“孩子被抢时一直在喊‘救命救命’,那声音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潘妍敏说,时至今日,她再未见过孩子。

放眼全国,与潘妍敏有过类似遭遇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却因对方抢夺、藏匿子女而长期无法与孩子相见。他们中有的正在离婚,有的已经离婚。

北京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婚姻家庭部主任张荆及其团队曾发表《“抢夺藏匿孩子”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蓝皮书显示,涉及子女抚养权和探望权起诉到法院的诉讼中,12%左右的案件都伴有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其中,抢夺、藏匿孩子的一方多数为男方。

“孩子被他爸爸抢走了,我该怎么办?”这是不少妈妈的心声。

抢夺藏匿孩子时有发生 多数由祖父母协助完成

王建娜一直计算着时间:现在距离孩子被抢走已经过去四年半了。

她清晰记得当时的画面——在小区里,刘某带着一帮人冲上来,抢走了仅6个月大的孩子,抢人者迅速离开,刘某还殴打了王建娜及其母亲。

王建娜给记者展示的监控视频完整记录了当时的事发经过。刘某正是孩子的父亲,他和王建娜举办了结婚仪式,但未领证。“我已经1600多天没见过女儿了,无法想象她现在的样子。”王建娜说,她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寻找女儿,没有一天停下来过。

类似的遭遇也发生在万腊梅身上。万腊梅起诉离婚,想争取两个孩子的抚养权。2020年9月,法院判决离婚,儿子的抚养权归其前夫,女儿的抚养权归自己。然而,在判决结果出来前,两个孩子却已经被男方带走,并且不允许她接触孩子。今年3月1日,万腊梅的抚养权强制执行案在法院立案,目前尚无结果。

共同的难题让这群女性走到了一起,她们于2019年10月创建了“紫丝带妈妈”群。近两年来,她们努力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拍视频、写联名信,反对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

据“紫丝带妈妈”群负责人朱莉介绍,目前群里有200多人,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她们遭遇的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九成以上由孩子的爷爷奶奶协助完成。

这个数字并不是全部。仅以广东省广州市为例,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广州法院审结5142件离婚纠纷案件,933件涉及抚养权、探视权纠纷。在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探视问题的案件中,超过八成都存在父母一方或双方将未成年子女私自带走不让对方行使监护权等情况。

四川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小明长期为“紫丝带妈妈”群体做法律顾问,据他介绍,除了喜欢孩子之外,一些男性抢孩子的目的,是为了和孩子形成一种稳定的生活关系,以此获得子女抚养权,占据财产分割上的优势地位;或通过“掌握”孩子,让女方答应自己的一些不合理要求。

这意味着,在一些父母的战争中,无辜的孩子成了棋子。

● 涉及子女抚养权和探望权起诉到法院的诉讼中,12%左右的案件都伴有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其中,抢夺、藏匿孩子一方多数为男方

● 除了喜欢孩子之外,一些男性抢孩子的目的,是为了和孩子形成一种稳定的生活关系,以此获得子女抚养权,占据财产分割上的优势地位;或通过“掌握”孩子,让女方答应自己的一些不合理要求

● 建议及时出台有关司法解释,在反家暴法中增加相关内容,并且在拒执罪的认定上增加涉及抚养权纠纷等人身权内容

争夺子女抚养权孩子变棋子 记者调查

“孩子被他爸爸抢走了,我该怎么办”



抢夺之后无心照顾孩子 容易造成巨大身心伤害

2017年6月,王建娜等来了法院的判决,孩子的抚养权归男方所有。记者在判决书上看到,判决理由之一为原被告分居后女儿一直和被告生活,“因孩子尚年幼,不应轻易改变其生活环境”,二审维持原判。

虽然王建娜有女儿的探视权,但男方却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见踪影。经王建娜申请,法院于今年4月26日发布公告,依法悬赏征集被执行人的下落。截至记者发稿,男方及孩子仍没有下落。

郭小明认为,法院在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抚养权的案件时,有多方面考虑,不轻易改变孩子的生活环境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被抢夺、藏匿孩子的一方并不一定是最适合孩子成长的一方。即使夫妻一方抢夺、藏匿子女,法院经过综合考量,也可能将孩子判给抢夺、藏匿一方,这无可厚非。

但被抢夺、藏匿孩子的一方往往对此很难理解。牵涉其中的很多妈妈也备受煎熬。

今年4月,在法院调解室,万腊梅见到了自己的儿子。陪同万腊梅到法院的朱莉恰巧碰到并记录了这样一幕:进法院之前,男方一

直在对儿子说妈妈不关心你、对你不好之类的话。后来母子俩见面时的气氛很僵。万腊梅想和儿子说几句话,儿子却离她远远的。

5月29日,在法院和男方进行沟通后,法官和万腊梅来到男方家中。万腊梅看到,6岁的女儿一口牙全黑了,但从未去医院看过牙;儿子已经很久没去上学了,向学校打听后得知是其父亲拿着孩子腰部和腿部受伤的诊断书请了假。陪同的法官提出,将考虑强制执行。

来自安徽的汪润同样心急如焚。今年1月5日,汪润上班期间,孩子的父亲与其父母未经告知便将孩子强行带离并藏匿,从那之后汪润就再也没见过孩子一面。

“孩子父亲一家目前住在乡下木瓦房子里,有大量欠款未还完,家庭经济压力巨大,还有其他不良行为,不合适也没能力抚养孩子。一想到这些,我几乎天天睡不着觉。”汪润说。

朱莉发现,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往往给家长及孩子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一些孩

子会缺乏安全感。由于抢夺、藏匿方大多是父亲,他们中的一些人无心照顾孩子,基本是由爷爷奶奶代为照料,孩子的学习成绩、精神状态普遍下降。有的藏匿方为了更好地控制孩子,甚至会对孩子进行洗脑、仇恨教育,非常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新未保法出台相关规定 注意收集证据维护权益

记者了解到,在孩子被抢后,大部分“紫丝带妈妈”都会第一时间选择报警等方式,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很难要回或者见到孩子。王建娜说,自己在孩子被抢后,立马报了警,但警方告诉称,孩子目前处于安全状态,最后被当成家事纠纷处理。

郭小明告诉记者,警察在遇到抢夺、藏匿孩子的情况时,一般会将其当作家事事处理。即使想管,也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妇联对此能做的也十分有限。

“遇到这种情况,除了起诉之外,其他方式可能都收不到太好的效果。但抚养权或探望权的强制执行,法院往往只能通过间接手段进行,比如法院通过对被执行人罚款、拘留等制裁措施,迫使其履行义务,这对被执行为方来说震慑力度较小,实际效果有限。剩下的一条路就是刑事诉讼,但拒执罪在法条中只有简单一句话,相关司法解释多涉及财产执行方面,抢夺、藏匿孩子还不在于拒执罪的司法解释中,因此很少有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罪名开启立案调查。当事人对此进行自诉,也很少成功。”郭小明解释道。

尽管如此,“紫丝带妈妈”群体仍然一直致力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据朱莉介绍,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目前“紫丝带妈妈”群里40个与抚养权判决有关的妈妈中,有近30个人的孩子已经回来。

朵朵被抢的当天,正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首日。在此之前,法律对父母一方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缺乏相关规定。新法明确规定: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

有观点称,新未保法虽然有上述规定,但没有规定违法后果,实际作用可能有限。不过,郭小明和许多“紫丝带妈妈”对此仍寄予厚望。

“法律对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是不认可的,那么在未成年入抚养权的诉讼上就会充分考虑这一点。因此,在遇到孩子遭受抢夺、藏匿的情况时,当事人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郭小明说。

他还建议,及时出台有关司法解释,在反家暴法中增加相关内容,并且在拒执罪的认定上增加涉及抚养权纠纷等人身权内容。“很多妈妈已经走到执行阶段,如果能够通过拒执罪给予男方较大的威慑力,将有利于问题解决。”

针对孩子被抢夺、藏匿后求助无门的困境,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陈中红建议,推广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多模式+云记录”抚养探视机制,借助抚养探视App或小程序,为双方在线上开设抚养探视微信档案,双方在该程序中就探视对象、探视时间、接送地点进行沟通,全程留痕,不可更改,作为变更抚养权或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法官可据此就不履行或履行不到位责任一方依法处理,对情节恶劣的采取拘留或移送公安机关启动追究刑事责任程序,遏制抢夺、藏匿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

采访中,有法官提醒,抚养权问题是婚姻关系解除后,当事人必然面对的孩子随哪一方共同生活的问题。直接抚养方的确定,并非否定非直接抚养方与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更不是双方在担任“父母”角色上的比拼,仅仅是法律出于保护离婚自由和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而对既有家庭安排或者分工的一种尊重。唯有当事人双方在子女问题上始终保持沟通、合作的态度,才能实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最大化。

制图/李晓军

□ 本报记者 张维

退改纠纷、大数据“杀熟”、限制交易条件、霸王条款、不合理低价游、捆绑搭售……当下,在线旅游问题不少。《法治日报》记者从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以下简称大数据研究院)联合消费者网近日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在线旅游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发现,在线旅游消费者投诉正是集中在上述几个方面。

“要坚持问题导向,严厉查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坚决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形成持续的监管整治力度,营造良好在线旅游消费市场环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

旅游市场逐步复苏 负面舆情远高正面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此前公布的数据,2021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56亿人次,同比增长15.7%,恢复至新冠肺炎疫情前同期的75.3%;清明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1.02亿人次,同比增长144.6%,恢复至疫前同期的94.5%;“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共2.3亿人次,同比增长119.7%;端午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8913.6万人次,同比增长94.1%,恢复至疫前同期的98.7%。

在旅游市场快速复苏的同时,在线旅游纠纷也明显增多。据大数据研究院监测数据,1月1日至6月30日,共监测到有关在线旅游消费舆情信息293万余条,其中,正面舆情信息14万余条,占比4.81%;中性舆情信息近200万条,占比67.73%;负面舆情信息超80万条,占比27.45%。虽然在线旅游消费舆情以中性信息为主,但负面舆情信息相对较多,达到正面舆情信息数量的近6倍。

梳理在线旅游负面舆情信息发现,因行程变更(包含消费者主动变更及因客观原因造成的被动变更)引发的退订、退款问题在2021年上半年旅游出行类投诉中占比48.8%;其次是由旅游出行产品/服务体验本身原因引发的投诉,占比19.4%;因商家格式条款(消费者主张的投诉理由)引发的投诉占比15.9%。

“在线旅游订单退改纠纷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报告》说,受疫情影响,2021年上半年在线旅游退改纠纷问题最为突出。机票、酒店、度假团等旅游产品均出现不少退改纠纷。

大数据研究院有关专家分析指出,在线旅游订单退改纠纷问题,暴露出平台、航空公司以及相关商家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往往通过自身优势或有关霸王条款把突发风险甚至自身管理问题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有的消费者因行程改变提前很长时间退票,或者因身体不适等原因退改订单,被要求收取高额手续费;而航空公司临时取消航班或酒店单方面取消订单,却不愿赔偿消费者相关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在线旅游平台还在订单退改上设置“灰色陷阱”,大打“擦边球”,甚至很多订单纠纷均来自一些平台背后预设的圈套。“有的机票销售代理商一度靠退票手续费盈利,通过大数据计算出退票概率,选择退票概率高的航线以超低价价格销售机票吸引消费者,同时设定高昂的退票手续费,类似趋利做法在行业内甚至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报告》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业内惯用操作手法。

大数据杀熟仍存在 强制交易屡见不鲜

有关在线旅游大数据“杀熟”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报告》显示,2021年上半年有关个人信息泄露的投诉较去年同期有上升趋势。

近日,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判决携程“退一赔三”的案例,被广泛认为是在线旅游大数据“杀熟”的一个代表性实锤案例。“希望此次法院判决携程大数据‘杀熟’案例能对行业起到警示作用。”大数据研究院有关专家表示。

近年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明显提速,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空前提高。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在线旅游经营者不得滥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基于旅游者消费记录、旅游偏好等设置不公平的交易条件等。

不过,消费者遇到大数据“杀熟”时很难举证维权,虽然吐槽和投诉大数据“杀熟”的问题很多,但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报告》同时指出,限制交易条件等问题仍然存在。随着各大平台陆续进入生态化运营阶段,“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运营思路成为强制消费问题的根源,尤其是部分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强制下载、开通账户或强制使用指定服务等情况屡见不鲜。

不合理低价游问题也有所抬头,大数据研究院通过多个投诉渠道监测发现,不合理低价游的投诉案例月环比呈现逐渐增多的迹象,其中多个案例涉及在线旅游平台。除了传统在线旅游平台,不合理低价游还“转战”微博、小红书、带货直播、驴友圈等社交平台。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发布了第一批、第二批“不合理低价游”投诉典型案例。比如,游客李某投诉,通过某在线旅游平台报名参加湖北荆门赴福建厦门纯玩五日游,团费880元,行程中,导游未经游客同意将其带到购物店,诱骗、强迫购置玉器5万余元;经荆门市文化综合执法支队调解,旅行社同意为游客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款5万余元。旅行社的违法行为另行“诉转案”立案查处。

企业坚守诚信理念 行业监管必须跟上

上述纠纷中,既有老问题,也有新动向。

陈音江分析,在线旅游消费纠纷和投诉增多的背后,首先是旅游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规范,部分经营者缺乏诚信守法经营理念和责任意识,没有建立必要的应急问题解决机制。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缺乏应有的责任担当,其次是消费者法律意识的提升、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旅游消费知识的不足,部分消费者对旅游消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遇到问题后依法维权的意识也越来越强,但同时少数消费者缺乏必要的旅游消费知识,也容易导致旅游问题和纠纷产生。

近期,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规划,将在线旅游确定为其中一项内容,并强调建立健全以在线旅游平台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链监管机制,完善网络巡查、情况通报、约谈警示等制度,推进在线旅游产品和服务标准建设,规范在线旅游市场秩序。

大数据研究院有关专家建议:在线旅游企业要进一步坚守诚信守法经营理念,积极主动承担法定责任和社会责任,自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首先,要为消费者提供真实、准确的旅游服务信息,不得进行虚假宣传;其次,要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等数据安全,不得通过大数据“杀熟”等手段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再次,要畅通消费者维权通道,妥善解决消费者诉求,平台应当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权,必要时可以先行赔付,再向相关经营者追偿。

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逐步完善,相关行业监管必须跟上,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得到有效落实。陈音江建议,充分借助和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解决一些在线旅游消费监管难、举证难、维权难等痛点,并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信用评级等机制,切实加强在线旅游行业监管;此外还要鼓励企业创新发展,公平竞争,允许企业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旅游服务,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报告》也提出,消费者要主动学习有关法律知识和旅游消费常识,不断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要选择具有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不要一味追求低价;要慎重签订旅游合同,并认真阅读合同内容;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尽量不要参加“零团费”“秒杀价”等宣传噱头的低价游;如遇到权益受损问题,要及时与经营者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应保留好证据,及时向消协或文化旅游部门投诉。必要时可以通过仲裁或到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盛光俊

晏丹(何爱民)题



▲ 近日,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昌吉边境管理支队北山煤矿边境派出所民警深入边境矿区开展安全检查。图为民警正在进行应急消防、疏散演练。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周游 摄



▲ 近日,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三支队民警深入辖区开展反诈宣传活动,提升广大群众的识防诈骗意识和能力。

本报记者 翟小功 本报通讯员 李建龙 摄



▲ 近日,吉林省扶余市公安局交警走进增盛镇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传活动,向群众宣传讲解交通安全常识。

本报记者 刘中全 本报通讯员 曹帅 摄